论卖国贼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原因

吴 德 华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了“芦沟桥事变”,中国开始了全面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的独立,挽救民族的危亡,不惜赴汤蹈火、浴血奋战、前赴后继地抗击日本强盗,谱写了一曲曲崇高的爱国主义壮歌。但是,身为国民党副总裁、中政会主席、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要职的汪精卫,却纠集一伙民族败类,不惜卖国求荣,甘当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工具,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叛国投敌,公开匍匐在日本侵略者的脚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最无耻的汉奸卖国贼。

汪精卫公开地出卖国家、民族,叛国投敌,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原因。但是,长期以来有人把汪的投敌,说成是蒋介石的指使,汪蒋演“双簧”;近来,也有人认为汪投敌,主要是与蒋争夺国民党“最高领袖”地位。我认为这些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都存在片面性,没有反映出最本质的问题。本文试就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原因,发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大亚洲主义”是汪叛国投敌的理论依据

日本帝国主义一直妄图灭亡中国,称霸亚洲。早在一九二七年内阁总理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向天皇的奏折中,就暴露了日本欲侵占中国东北、吞并中国、独霸亚洲、征服世界的狂妄野心。以后,又制造了一个以黄种人反对欧美白种人,以东方固有文化反对西洋文化的所谓“大亚洲主义”、“建设新东亚秩序”的强盗理论,作为其独霸中国,称霸东亚的借口。但是,汪精卫却把这个强盗的侵略理论,故意与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混为一谈,大肆宣扬孙的“大亚细亚主义”即是日本的“大亚洲主义”,日本的“大亚洲主义”即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大亚洲主义”是以“中日合作为前提”,等等谬论。

孙中山一九二四年应冯玉祥之邀北上,途经日本神户时,确实作过“大亚细亚主义”的演讲,说过“中国同日本是同种同文的国家,是兄弟之邦”,应该“亲善”^①。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评论孙中山“大亚细亚主义”中存在的种族主义色彩、封建的仁义道德观,及对日本帝国主义存在一定幻想等问题。孙的“大亚细亚主义”强调了以下的思想:第一、日本已是一个“世界列强之一”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是十几国的殖民地”,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亲善,“我看是做不到的事”。若日本“真有诚意来和中国亲善,便要先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回主人的地位,让中国人得到自由身份,中国才可以同日本亲善。”^②很显然,这是要日本以平等地位看待中国,在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第二、指出日本已是世界帝国主义的“鹰犬”。孙说:“你们日本民族既然得到了欧美霸道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③第三、孙在“大亚细亚主义”中所指的中日“亲善”,是对日本人民讲的。他说:中日关

系，无论那一方面，“两国国民都是应该要携手，协力进行，共谋两国前途的发展。”又说“我们两国国民向来的口头禅，都说中国同日本是同种同文的国家，是兄弟之邦，两国国民应该要携手”^④。但是，中国受到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以中日还做不到“携手”、“亲善”。总之，孙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本质，是要唤醒中日两国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唤醒日本国民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策，这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新秩序”、“大亚洲主义”，是根本不同的。

汪精卫却有意地歪曲、篡改孙的“大亚细亚主义”。认为孙中山有一个“永远不变的信念，便是以中日合作为解决东亚问题之核心”，故意掩盖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事实，说什么“中国是兄弟之邦，亚洲是我们的家庭，我们应该怎样的互相帮助、互相合作，来复兴我们的家庭啊”！他喋喋不休地叫嚷什么“中日合作不但于中国有利，并且于日本有利，于东亚有利。”而且，汪认为要“谋大亚洲主义实现”，中国必须和日本做到“外交方针一致，国防方针一致”，“要联合那个，使两个国家一起与之为友，要对抗那个，便两个国家一起与之为敌”^⑤。所谓“一致”、“一起”，就是要中国心甘情愿地做奴隶、傀儡，日本做奴隶主、中国的殖民统治者，以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在所谓“打破百年来欧美殖民主义的压迫”的幌子下，独占中国，称霸东亚；在所谓“防止第三国际扰乱阴谋，使共产主义不能流毒于中国，不能流毒于东亚”的借口下，消灭共产党，扼杀中国革命，永远奴役中国人民。汪还把“大亚洲主义”，偷换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胡说日本首相近卫灭华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正是大亚洲主义的理想，也就是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而“本着三民主义做去，中国固然得到自由平等，同时也有了力量与日本分担东亚安全、建设东亚的责任。所以，就中国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就东亚来说，三民主义也就是大亚洲主义。”^⑥曾经自称是孙中山“忠实信徒”的汪精卫，不仅出卖国家、民族，连三民主义也要卖掉，变成联帝、反共、反农工的伪三民主义——灭亡中国的“大亚洲主义”的代名词。

汪精卫把这个“大亚洲主义”敬若神明，实际上只不过是一层透明的遮丑布。一九三五年一月，日本外相广田在积极侵略华北的同时，发表了“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侵华方针。汪立即公开赞同，说这个方针“和我们素来的主张，精神上是大致吻合，中日两国间既有如此的共鸣，加以互相的努力，中日关系，从此可以得到改善的机会，而复归于常轨”。他还坦白地郑重地声明：“愿以满腔的诚意，以和平的方法，和正常的步调，来解决中日间一切纠纷，务使互相猜忌之心理，互相排挤、妨害之言论及行动等，一天一天消除，庶几总理当日对于中日携手的希望，可以期其实现”^⑦。全面抗战后，汪虽迫于全国人民的抗日压力，不得不口头上喊几句“抵抗”，实际上是用其全力来实现“大亚洲主义”和日本强盗做“朋友”。他曾说：“和人做敌人，固然要有相当准备，才够得上；和人做朋友，也要有相当准备，才够得上”^⑧。但是，尽管汪精卫积极地为实现其“大亚洲主义”而进行种种卖国活动，却因为全国人民坚持抗日，使他觉得还只是“枝枝节节”、“无补大局”。因而，他要“从根本上做起，为中日关系划一新时代”^⑨。只有叛国投敌，才能实现他们的“大亚洲主义”。

总之，“大亚洲主义”是汪精卫叛国投敌的理论依据和遮丑布。

二、民族失败主义是汪精卫成为民族投降主义者的主要原因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军事进攻与政治诱降两手交替使用的策略，汪精卫完全被日本的威胁、利诱所征服。

日本帝国主义以其发达的经济、军事力量，乘蒋介石踌躇满志地要消灭共产党与异己势力之时，发动了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又乘中国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形成，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之机，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中国的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的全部或一部分地区，战火烧遍了大半个中国，国民党政府迁到了西南的重庆，中国处于危亡之中。

对于中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有决心、有信心争取抗战的胜利，并以极大的牺牲去夺取最后胜利。毛泽东对这一战争，进行了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后指出：“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他的结论是：这场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⑩。这一精辟的分析，是指导中国抗战胜利的指针。

汪精卫则被日本侵略军的气焰所吓倒。

还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之时，汪就认为日本是“一个国富兵强的国家”，中国“军事经济一切社会组织及社会能力都落人后”^⑪，不能立即抵抗，只能妥协投降。于是他制造了一系列的不抵抗谬论：

“忍辱负重”论。他说什么“一切穷和弱的国家，口口声声说爱国，便有亡国的危险”。怎么办呢？只有“沉默”，“越沉默，越坚决，越勇壮，这是苦命的国民，安排吃苦的最要办法。”^⑫否则，主张抗日，便是“浮嚣”、“不度德、不量力，好大言、无实际”^⑬，是“幼稚的”、“虚骄的爱国心”。

“救亡图存”论。所谓“救亡图存”就是要与日本“议和”，他说：“如果有一丝救亡图存的机会，则断断不可将一丝的机会错过了去，必须专心至致的埋头苦干”^⑭。如何“救亡图存”呢？他说：“其没有侵略野心的，我们固然愿意在两利的原则之下，共同努力，即使有侵略野心而且见之于行动的，我们也愿意以十二万份的诚意与忍耐，求其觉悟，走上共同生存发展之途”^⑮，总之，“救亡图存”就是不抵抗。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论。他说什么“因为不能战，所以抵抗，因为不能和，所以交涉，政府应付困难的态度，不是‘不和不战’，而是抵抗与交涉并行”。实际上，只有“交涉”，没有抵抗，“交涉”是不抵抗的代名词。

正是在这些不抵抗的谬论指导下，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期间，中国先后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把中国的领土、主权送给了日本侵略者。

全面抗战开始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同时，对国民党政府开展诱降活动。在南京失陷前后，日本请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企图迫使蒋介石政府投降。但“调停”因日寇条件过苛，蒋介石不敢接受而破产了。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接着，相继发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和进攻广州，妄图在这些地方消灭国民党军主力，迫蒋投降。并且，纠集北洋军阀余孽、民族败类，先后组织起以王克敏为头子的“华北临时政府”，以梁鸿志为头子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还企图策划二个傀儡政权合流为伪中央政府，以迫国民党政府投降。但是，日本侵略者看到，这些所作所为效果不大，于七月决定了分裂国民党内部，起用以汪精卫等所谓“中国第一流人物”的方针，并开始了要蒋下台，诱汪取代蒋的活动。

汪精卫既怕日本继续进攻，又被日本的诱降政策所倾倒。一方面，他高唱“战必败”的亡国论，说中日战争不是因为日本侵略而发生，而是那些“高唱持久的、全面的战争的人逼迫蒋介石而发生的”，战争若“继续打下去，中国是决不能侥幸成功的”，因为“中国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没有一件能和日本比拟”。如果依靠英美苏打日本，“日本当然是要遇困难的，但是日本已觉得痒的时候，中国已觉得痛了。等到日本感觉到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⑩他还大肆地散布“毁灭”论和“焦土抗战”论，说什么“我们是弱国，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的目的也达到了”^⑪，结果是“人人皆成斋粉，物物皆成灰烬”^⑫，他们自己也将随之而灭亡。总之，他认为不能再抗战了，只有投降。

另一方面，汪精卫决心要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和谈”，效法卖国贼李鸿章，当八国联军入侵时，代表清政府同各国帝国主义签订辛丑条约，并勾结帝国主义共同镇压义和团。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老实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老实实承认打败”^⑬。并且在南京纠集国民党内有权有势的亲日派，组织了一个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周佛海为首的“秘密卖国团体”“低调俱乐部”，在汉口组织了以周佛海、陶希圣为头子的、专门反共卖国的“艺文研究会”（该会在长沙、广州、成都、重庆、西安、香港等地设有分部，拥有几十家报纸），加上原有的以陈公博为首的一部分改组派，这些就是汪精卫进行卖国的“和平运动”的班底。这些人在所谓“战必大败，和却未必大乱”的口号下，以汪“为中心，企图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⑭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本侵略者“求和”。当陶德曼“调停”失败后，他们非常惋惜“和平机遇”中断，并以“不死心，不绝望”的态度，“暗中努力使和平之门不要全关，和平之线不要全断”。^⑮他先后派董道宁、高宗武等去上海、香港、日本东京等地与日寇进行秘密谈判，进行卖国交易。汪得知日本要他出马取代蒋时，他又派高宗武、梅思平到上海与日寇举行“重光堂会谈”，于十一月十二日签订了出卖中国的协定，制定了汪出逃的计划。十二月十八日，汪一伙叛逃重庆，投入日本侵略者的怀抱。

汪精卫既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吓破了胆，又被日本的政治诱降“诱”出其卑鄙的灵魂和咀脸，从民族失败主义发展成为民族投降主义的卖国贼。

三、反共重于卖国是汪精卫投敌的阶级原因

汪精卫自一九二七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已是一个“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共、反革命头子。“九·一八事变”后，汪蒋“合作”“剿共”、灭共。他刻骨的仇恨共产党，叫嚷务必“集合各军，悉力进剿，务期于最近期间清除匪祸”^⑯。

汪精卫为什么那样地爱日本侵略者，把他们当成“朋友”、“兄弟”、“一家人”？为什么对共产党这样仇恨呢？道理很简单，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投降派的汪精卫，是靠日本强盗的支撑、靠卖国起家的，其统治地位也要靠日本侵略者来维持。而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民族利益的代表，是团结全国人民抗战的中坚，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汉奸走狗汪精卫之流也必随之完蛋。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反共是日汪的主要目的。他们知道共产党抗战最彻底，国共合作则力量更大，他们就用全力分裂国共合作，使两党各自孤立，最好是两党打起来”^⑰。

汪精卫为消灭共产党，制造了许多恶意指责共产党的谬论：

“杀人放火论”。他胡说什么共产党是“生吞活剥强行土地政策……其实行必出于屠杀，始

则煽惑贫农为夺取土地而屠杀地主，继则驱使贫农互争土地而自相残杀。”而这种“杀人放火政策”使得“社会经济全部破坏”，“民不聊生”，和“帝国主义者欺骗殖民地的方法一样的糖面的苦心的毒药”^{②4}。这是道地的地主豪绅攻击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的理论。

“心腹之患论”。他诬蔑中国内部“匪气肆虐，患在心腹，赤焰充塞，人伦禽兽，若不剿除，不特人民无乐业可言，即一切计划均受牵制，乃至捍边固圉，御侮自卫，亦皆不能为有效之实施。”^{②5}当然“御侮”是借口，“剿共”灭共以扫除投敌的障碍是真。

“亡国论”。他刻骨地仇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胡说“不特中国目前实行共产，可以亡国，即使接近共匪，受其操纵，也足以引起大乱，而至于亡。”^{②6}他认为，如果不“剿共”，就会出现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一样，“中原各省肆意纵横，弄得赤地数千里，流血成河，卒之北京沦陷，中国灭亡。”^{②7}并说“李自成是米脂人，张献忠是延安人，从米脂、延安数起。游击战焦土战遍于全国……如今共产党的巢穴，正在米脂、延安一带，想到这里，不寒而慄。”^{②8}他甚至公开反对“与其亡于外人，不如亡于共”的说法，坚持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下，“宁亡于日”，也不让共产党领导人民得解放。

“共管论”。汪胡说什么“日本单独侵略中国，为祸固烈，然若共匪得志，蔓延长江，势必导致于各国共管，为祸尤烈。……现在共匪无异是日本的别动队。”^{②9}

汪精卫这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反共谬论，完全是为他们的所谓“非和平不能建国，非反共不能和平”^{③0}的卖国投降主义服务的。

为了反共，汪精卫等制定了“治本莫过于充实国力，治标莫过于清除共匪”的“救国方针”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要反动分子“铭心刻骨”地记住“不安内不能攘外”，说什么“共产党猖獗”之时，“吾人惟有忍辱负重，努力和平”^{③1}。指责不反共的主张是“误国政策”，要人们按着他们的计划和步骤去做，“万不可为共匪所摇惑，中了他挑拨离间的毒计”^{③2}。他叫嚷要采取一切反革命手段消灭共产党，“决不能使毒蛇猛兽，一日留存于世”^{③3}。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蒋汪统治的国民党政府不仅一次又一次的向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发动围剿，而且对要求联共抗日的冯玉祥领导的察绥抗日同盟军、蒋光鼎等领导的“福建人民政府”，进行残酷镇压。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迫于人民的抗日压力，与共产党达成了合作的协议，汪精卫一伙却竭力进行破坏。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前，他大肆攻击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不是“真意”，是“靠不住”、“不守约”的，说什么共产党“表面放弃阶级斗争的宣传，而实际则混入民众里头，以行其分化的作用，而促成整个民族团结之崩溃”^{③4}。国共合作形成后，他又说什么这只是给共产党“自新之路”，“绝非容共”，“不但苏维埃政府与红军不能存在，即共产党组织及宣传，亦为团结救亡之义所不能容许”^{③5}。他时时刻刻不忘消灭共产党和破坏国共合作，以结束抗战，投降日本。陈公博曾说，如果再不与日“和议”，日本再进攻重庆，“我们已无路再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为共产党的俘虏”，如果中日继续战争，“结果便宜了苏联，在国内只替共产党做机会”^{③6}。汪精卫也曾毫不掩饰地说：“自抗战以来，最使我痛苦的一件事，是共产党人夹杂在里头，我之离开重庆，十之八九是因为共产党人夹杂在里头。”^{③7}又说：“余之反共，中外所知，余决不邮膺反共之名，而谋中日和平之实现。”^{③8}

汪仇恨革命，仇恨共产党到了疯狂的程度，反共是降日的准备；而反共超过了卖国，这是汪精卫由亲日派发展为卖国贼的根本的阶级原因。

四、争当国民党“最高领袖”是汪叛国当儿皇帝的又一重要原因

蒋介石、汪精卫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一九三二年之前，他们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之后，他们在反共、反革命的基础上“联合”执政，共同卖国。但是，他们之间并非毫无区别。第一、汪是亲日派，是日寇侵略中国的得力工具，只有投降，无“攘外”真意。蒋是亲英美派，对日也妥协、退让，但在侵略者危及他的统治时，会起来抗日，有一定程度的“攘外”之意。第二、蒋是国民党的最高统治者，需要汪辅佐，但又不允许超越一定范围；汪要利用蒋推行投降的“和平路线”，但又觉得蒋有碍手脚，不愿长期“屈尊”于蒋之下。蒋汪之间的这些区别与矛盾，加上过去争权夺利斗争的历史原因，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强与抗日战争全面开展，就逐渐激化起来了。

蒋汪合作以后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认为中国的武力不足以抵抗日本，而自己因不抵抗，又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便利用汪精卫等亲日派与日本周旋。汪精卫则利用已取得的行政院院长、外交部长之权，与日本勾搭，出卖国家民族的主权，以换取日本的支持，并“挟日以制蒋”。蒋也为转移群众抗日反蒋情绪，利用群众抗日要求以制汪。在六月十九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蒋派吴稚晖指责汪的“忍辱求全”，“只是忍辱以后求整个国家能完完全全送给敌人”，戴季陶、孙科骂汪是秦桧、“汉奸卖国贼”，要汪对签定的卖国条约负责，并且群起质问汪，“汪每答一词，驳者以十词责之”，“会议由二、三小时，延长到六小时”，“愤怒时击桌助势，致敲碎桌上茶杯。”^{③⑨}汪精卫受讥讽、怒骂，“愤而退席”，称病呈辞去青岛。实际上，汪辞职是逼蒋对日政策表态，挟日以制蒋。当即，日本陆相声称：“汪氏辞职将使中日合作前途受极大挫折……日本深感今后失却与此东方伟大政友接触机会，尤属不幸”^{④⑩}。日本军部也表示：“不许汪辞职，更不容许汪辞职而变更对日外交政策。”^{④⑪}蒋介石虽不满意汪的作法，但又不肯得罪日本帝国主义而改变不抵抗政策，只得亲自出面“慰留”汪，请其复职。汪便乘机复职，继续推行卖国投降路线。当时，有人劝汪不要干了，何必背“秦桧”、“卖国贼”的罪名？汪却振振有词的对陈公博说：“人家送国是有限度的，我汪精卫送国是有限度的”。“我不独要干下去，我劝你也干下去”。^{④⑫}一场“倒汪”的风波虽暂告平熄，但十一月一日的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期间，汪又遇刺受伤，随即出国。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被迫联共抗日了。从国外回来仍以第二号人物辅佐蒋的汪精卫，又不同意蒋的联共抗日政策，不甘居辅佐地位。两人之间的矛盾时隐时现，日趋激化。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时，蒋认为日本提出的条件可以做谈判的基础，但不能马上签字，汪则几次催代行政院长孔祥熙立即签字。当这次“调停”的阴谋被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揭露，激起全国人民反对时，蒋介石十分难堪，大发雷霆，一面骂抗战派“硬把国家弄到这个样子”，一面指责汪派，“以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殊不知此时求和，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内乱益甚，彼辈见其危，不知其害，不有定见，何能撑此大难也。”^{④⑬}南京失陷后，日寇采取“不以国民党的对手”的政策，全力压迫中国政府投降。其企图是：“如果旧南京政府投降，便把他们合并于新兴中国中央政权之下；如果不投降时，便倾全国的力量把旧南京政府击溃或迫使其投降；同时扩大并加强亲日各个政权，尽快使这些政权集其大成地统一为一个政权，形成为中国中央政府，以此使内外不能不承认新政权代替旧南京政府。”^{④⑭}并确定：蒋下野，以汪取代蒋为“交涉和平”的对象。日寇政策的变化，对于长期以来与蒋介石争权夺利的汪精卫是莫大的支持。汪更积极向日“求和”，十月十二日汪向德海通

社发表“和平之门未关”的谈话。十月底召开的第二届参政会上，他一面公开地反对陈嘉庚关于“在敌寇未退出国土前，凡公务员有敢谈和平者，一律以汉奸卖国贼论”的提案，胡说宪法上规定国家有讲和的大权，是规定有做汉奸的大权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匾字，其解释应该是“忠孝仁爱信义汉奸了！”^⑮另一方面，又支持陶希圣等投降派提出反共倒蒋的提案。为此，蒋曾对陶下了“严重警告”^⑯。

十一月中，高宗武与日本经过重光堂会谈，商订了卖国的上海协定，制定了汪出逃的计划，汪又多次劝蒋与日“议和”。十六日，汪对蒋说：“国家民族濒于灭亡是国民党的责任，我们应联袂辞职，以谢天下”^⑰，又一次“挟日以制蒋”，逼蒋投降。蒋介石既怕因放弃抗日旗帜，导致共产党和国民党内抗日派的反对，使自己垮台；又看到日本所提的条件，“在中国万难接受，故决继续抗战。”^⑱在十二月九日的会议上，蒋汪又进行了最后一次“争论”。汪极力声称：“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争，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及互知之，故和平非可无望。”^⑲蒋仍未接受汪之意见。汪抱怨“政府既然日日瞒着良心来说硬话，一般人何苦讨没趣？何况一出口，就被指为汉奸，一般人心中想想，亡国是大家有分，汉奸的罪名要我一个人承担，这更何苦。”^⑳对于这次争论，陶希圣曾说：“蒋先生十二月八日到重庆，他的态度完全改变，对于国家处境困难，全不考虑，他的全部计划在提携共产党……对日的议和，不加思索的拒绝。这样的变动及客观困难，使汪先生及我们感到一年半的努力进言都成了画饼，都更成了罪状”。而蒋“幻想支配了一切，我们才下决心出国”的㉑。汪精卫后来也说：自从抗战以来，时时刻刻“想着怎么可以觅和平？我们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等到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我于去年十二月九日经过一番剧烈辩论之后，知道在会议里无采取之望，才于十八日离开重庆。”^㉒

汪精卫与蒋介石的“政见”分歧与“斗争”是早就存在的。但汪无法斗过蒋，就企图以卖国求荣、充当儿皇帝来借日寇制蒋，达到居蒋之上之目的。

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是在强敌侵略面前，完全丧失了民族气节，屈服敌人的压力和仇视共产党及革命力量，加上争夺国民党最高领袖地位而导致的，最后成了孤立于人民之外、孤立于尚愿抗战的国民党之外的一小撮汉奸、卖国贼的头子，成为中国历史上千古罪人。汪精卫及其一伙叛国投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与其他党政军要员达四十余人，这是国民党的一次大分化，给中国的抗日战争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同时，汪的叛国投敌，又从反面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和抗战到底的决心。汪精卫叛国后，全国人民掀起了讨汪高潮，彻底揭露了汪逆的卖国贼咀脸。汪逆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秦桧化身，人人唾骂。同时，也教育了人民，使他们认识到：中国的出路只有坚持抗战，坚持胜利；谁与日本侵略者“讲和”，谁就是汪精卫第二，谁就是卖国贼；谁要中途妥协，谁就是要使中国亡国灭种；谁要反共，谁就是为降日作准备。在一片反对投降、坚持抗日的浪潮声中，那些隐藏在国民党内的投降派，不敢轻举妄动。

注释：

①②③④ 《孙中山由上海经日本之言论》。

⑤⑥⑦⑧ 汪精卫：《三民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⑨ 汪精卫：《就寻求与国团结民众再引申几句》。

⑩ 毛泽东：《论持久战》。

⑪ 汪精卫：《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⑫ 汪精卫：《老话》。

⑬ 汪精卫：《消沉与沉着》。

⑭ 汪精卫：《救亡图存》。

⑮⑯⑰ 汪精卫：《怎样救亡图存》。

(下转80页)

- ⑳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第95页。
- ㉑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折冲府卫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
- ㉒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第96页。
- ㉓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第101页，“道”下缺“龕”字。
- ㉔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第104页，“张龕”为张道龕双名单称。
- ㉕ 《唐六典》卷三十。
- ㉖ 《唐律疏议》卷十五厩库损败仓库积聚物条疏议。
- ㉗ 日比野丈夫《唐代蒲昌府文书之研究》(载《东方学报》第33册)。
- ㉘ 劳干《居延汉简考释》考证式烽燧类。
- ㉙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六尺为步，步百为晦⁷。师古曰：“晦，古亩字也”。邓展曰：“汉时二百四十步为晦”。
- ㉚ 侯灿《论楼兰城市的发展及其环境变迁》(载《新疆社会科学研究》第7期1982年3月)。
- ㉛ 《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贞元二年(786)八月条。
- ㉜ 《唐六典》卷七工部屯田郎中条。
- ㉝ 见《唐令拾遗》军防令第十六。
- ㉞ 《唐六典》卷三十载：镇有仓官，上镇有仓曹，中下镇不设，由兵曹兼管；戍无论上中下皆不设仓官，可见镇戍有仓原则上设在镇。
- ㉟ 《新唐书·食货志》载同。
- ㊱ 本文所引阿斯塔那226号墓所出文书均收在《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八册。

〔附记〕

笔者所撰《唐代烽堠制度》一组论文，惠承唐长孺师指导，并对文章进行了仔细修改，谨此致谢！

一九八五年三月八日

(上接87页)

- ①②③ 周佛海：《回忆与前瞻》。
- ④ 汪精卫：《最后关头》。
- ⑤ 汪精卫：《如何使用民力》。
- ⑥ 汪精卫：《大家要讲老实话，要做老实事》。
- ⑦⑧⑨ 1933年7月28日。汪精卫蒋介石致冯玉祥俭电
- ⑩ 毛泽东：《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 ⑪⑫ 汪精卫：《在国府纪念周讲话》，1933年12月。
- ⑬⑭ 汪精卫：《抗战与剿共》。
- ⑮ 汪精卫：《所期望于民国三十年者》。
- ⑯ 汪精卫：在伪国民党“六大”会上的讲话。
- ⑰ 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讲话。
- ⑱ 汪精卫：在中枢两纪念周讲话。
- ⑲⑳ 陈公博：《八年抗战》。
- ㉑ 汪精卫：《欧战与中国之前途》。
- ㉒ 汪精卫：《重要声明》。
- ㉓ 1937年8月12日《中兴报》。
- ㉔ 1937年8月16日《中兴报》东京电。
- ㉕ 1937年8月17日《中兴报》上海电。
- ㉖⑲ 汪精卫：《今井武夫回忆录》。
- ㉗ 日本外务省就汪伪政权成立经过向内阁的报告。
- ㉘⑳㉑ 汪精卫：《复华侨某君书》。
- ㉒ 陶希圣给胡适信，1938年12月31日。
- ㉓ 胡适在纽约律师俱乐部演说。
- ㉔ 汪精卫：《致中央常务委员会 国务最高会议书》。